

评《翻译研究导航》

崔莹辉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翻译学院, 威海 264209, 山东)

翻译研究有两种有趣的现象值得注意: 一是有关翻译研究的重复话语不断增加; 一是翻译研究似乎到了“理论沉寂期”。近几年有不少书籍对业已取得的翻译研究成果梳理了又梳理, 期望在回顾和反思中寻到继续发展的灵感。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 新方法和新见解明显没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新理踵出、交相辉映。翻译理论的重复激增使得翻译学研究更加复杂, 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反思则要求翻译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在此背景下, 由多语出版社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7年出版, 苏珊·巴斯奈特 (Susan Bassnett) 和埃德文·根茨勒 (Edwin Gentzler) 主编的翻译研究主题系列丛书第34集《翻译研究导航》满足了学科发展的背景要求。

《翻译研究导航》的编者 (Piotr Kuhlczak 和 Karin Littau) 在前言中阐明, 该书旨在“为关注翻译研究的学者在该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一张精确的导航地图” (P.7) ^①。该文集以翻译研究为核心, 选择有代表性的相邻学科探讨和翻译研究的互动关系, 从不同学科视角对翻译学进行更深入系统的跨学科研究。那么, 为什么说翻译研究具有跨学科性质? 认定一门学科具有跨学科性质, 多甘和帕尔 (2000: 142) 认为要具备以下条件: 首先, 概念的相互借用, 指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新兴学科向水平较高的学科借用成熟的概念。这种概念的借用往往扩展了研究视野, 并且拉动了新兴学科的分析水平。例如, 霍姆斯 (Holmes, 2000: 175) 在为这门学科命名时, 就参考了俄罗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美国研究 (American studies)、英联邦研究 (Commonwealth studies)、人口研究 (population studies) 以及传媒研究 (communication studies), 借用了英语中为学科命名时活跃使用的一个术语 “studies”, 而最后定为“翻译研究” (translation studies)。其次, 研究方法的移植、模仿和渗透。这在翻译研究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尤为突出, 如最初借用语言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 之后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使其研究丰富多彩, 斯奈尔-霍恩比 (Mary Snell-Hornby) 在《翻译研究: 综合法》中就是借用语言学和文学的概念、方法来研究翻译学。最后, 理论的借用。卡勒 (Culler, 1997: 15) 解释“理论”概念时, 一开始就认为“理论具有跨学科性”。翻译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能够迅速起飞、并平稳发展, 其主要原因在于它吸收并内化了相邻学科的概念、研究方法和理论原则, 从而扩充了翻译研究的知识体系, 使得翻译研究具有巨大的活力和潜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翻译研究在跨学科语境下崛起, 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色。

一. 内容简介

无论出版任何文集, 首先要考虑选题。本书编者意在为读者在翻译研究话语的皓海中提供权威导航, 选择他们认为最好的领航员, 于是在每一章节都由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翻译理论家专门供稿。据不完全统计, 与翻译研究相关联的学科大约有二十几门, 本集挑选出九个主要的相邻学科: 文化、哲学、语言学、历史、文学、性别、戏剧、屏幕和政治——因为这些领域与翻译研究已经、并将持久进行学科间卓有成效的互动发展。

该书提供了撰稿人信息, 读者能够查到这些专家的学术背景及研究方向。书后提供的索引便于读者迅速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而附录中翔实的二十九页参考文献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

料。

在第一章“文化与翻译”中，苏珊·巴斯奈特首先阐明翻译研究需要文化转向的理由。她认为，一方面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可以看作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中系列文化转向（如语言学的语篇分析和语料库、文学从后结构主义到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杂合理论等系列新方法，以及历史学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等）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翻译在文化互动中起着极其显著的社会作用，因为通过比较原文和译文文本，可以揭示出两种文本所涉及的两种文化体系的关系。作者认为以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为代表的多元系统理论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奠定了基础，因为它强调翻译在文学和文学史中的作用以及翻译文本在接受语文化中的地位。在第二部分，巴斯奈特指出文化转向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两个工具：文化资本和文本格。她强调，所有文化都有先于语言（pre-exist language）存在的文本格，它反映在某一文化下社会成员深入内心的期盼模式。作者引用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的观点阐明文本格的重要性，“在翻译过程中由于文本格的差异引发的问题至少和由于语言差异产生的问题一样多”（P.20）。论文行将结束时，作者谈到游记与翻译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以克罗宁（Michael Cronin）为代表，他用“游牧”（nomadism）来形容旅游者和译者的相似点（Cronin, 2000:150）。巴斯奈特总结为“游记，和翻译一样，为读者提供另一种文化版本，是对他者文化的构建”（P.22）。

在第二章“哲学与翻译”中，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认为“作为客户代理学科（a client discipline）的翻译研究在借鉴哲学话语的同时，事实上，也在借鉴很多其他的媒介学科”，这清楚地反映出翻译的跨学科性质（P.24）。他从三方面来说明翻译研究与哲学话语的关系：翻译只是作为哲学的个案研究；哲学作为翻译研究理论化的权威引证；评价哲学话语翻译。针对翻译作为哲学的个案研究，皮姆认为西方哲学传统上没有研究翻译的话语，根据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和威密尔（Hans Vermeer）考证，在古希腊、古罗马以及中世纪的哲学话语中几乎没有对翻译的研究（P.25）。美国分析哲学家奎因（Willard Quine）明确把翻译当作思考的实验对象，当作思考认识论原则的一个例证。翻译研究者在构建翻译理论时，为了使自己的论据具有说服力，经常引用一连串名字，如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E. Schleiermacher），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德·曼（Paul De Man），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把这些人的地位从语言学家、文学理论家、思想家、神学家但是并非总是哲学家的复合身份提升为哲学家，以借用他们的权威性，试图使自己观点更加深刻。这种特权读者（翻译理论家）截取他们的话语片断，对其诠释，结论难免片面。目前这种引用已经相当普遍，皮姆予以澄清的是，事实上这些哲学权威部分是翻译理论家自己创造出来的，正是因为如此，几乎没有哲学家会完全认同翻译理论家借以他们的名义所得出的推论。最后，作者探讨了翻译和哲学之间的未来研究，提出哲学话语对翻译研究作用的有限性。他声称，哲学话语不是用来提供翻译研究中所有问题的现成答案，建议对翻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不是去读更多的哲学，而更应该辩证地关注译者的实际问题”（P.44）。对此他提出翻译研究中哲学何时适用的原则。作者在文中系统地剖析了翻译研究和哲学间研究的不平等关系，揭示了存在的模糊问题。

第三章是格尼拉·安德曼（Gunilla Anderman）的“语言学与翻译”，作者从历时角度全面回顾了翻译研究和语言学之间的关系，同时，列举了语言学代表性人物及其主要理论概念，以及以某种方式对翻译研究产生的巨大影响。文中提供大量实例，从“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到奈达（Eugene Nida）为翻译理论提供一个语言学框架，使翻译研究之初获得了学理基础。随着语言学的发展，语境概念得到重视，从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文化语境（context culture），弗思（J. R. Firth）的意义在语境中才能起作用（meaning as function in context），发展到韩礼德（Michael A.K. Halliday）在许多不同等级中体现不同语言功能的语

境等。此外,卡特福德(J. C. Catford)的转换概念(shift),纽马克(Peter Newmark)的语义和交际翻译,对等概念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以及德国功能学派,文体学、语用学、类型学等等,这些语言学理论在翻译研究领域逐一登场,每一次范式变更都对翻译研究造成一定冲击,既丰富了翻译学理论,又不断拓宽其研究视野。安德曼认为语料库语言学最有潜力,它的出现已经赋予翻译学者很多新的启发。

第四章琳·朗(Lynne Long)的中心议题“历史与翻译”,文章开头引用欧阳桢的话“没有翻译,也就不存在世界史”(P.63)点明翻译的重要性。朗指出翻译史不仅仅指翻译理论史,应该把翻译理论史和翻译起过重要作用的文学研究以及社会思潮结合起来,才能构成完整的翻译史。作者提醒读者翻译原则是灵活多变的,历史语境下的译本能够解释译者当时采用的翻译策略以及反映译者的态度。作者澄清,有很多英语文本被当作原文,如《伊利亚特》(*Iliad*),《贝奥武夫》(*Beowulf*)和《圣经》(*Bible*),其实是从古英语和别的语言翻译过来的。她强调翻译史与科技发展必不可分,如伴随计算机发展的语料库研究和机器翻译。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引用大量相关的实例,从语言、文学,到宗教、哲学等跨学科视角,在翻译史的长河中为读者描绘一张清晰的导航图,并鼓励这些领域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极佳起点。

第五章题为“文学翻译”,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旨在解释文学翻译的定义及其独特之处,同时根据美国比较文学协会(ACLA)(Bernheimer, 1995)的三个专业标准报告(Reports on Professional Standards)探讨翻译和比较文学之间变化的发展关系。赫曼斯认为,文学翻译研究要通过指出翻译重要性而从比较文学语境中取得合法性,译文不仅作为原文替代品,而且要作为象征性经济(symbolic economy)的重要筹码,以及作为观念、态度和价值的载体。作者从语言学、功能主义和干涉主义三个方面来讨论文学翻译研究的主要发展脉络。在语言学方面,作者从语料库和批评语言学分析文学翻译,借用曼迪(Jeremy Munday)的建议,把韩礼德的三个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与语料库研究结合起来探索原文、译文间的语言差异,并且同社会和意识形态语境联系起来,这样,语言概念的精确以及计算机研究的广泛覆盖面使得一种详细并可以再现的新型研究成为可能(P.87)。作者在介绍功能派研究时勾画出描写主义的发展主线,讨论了性别和后殖民主义等方法反思身份、地位、道德规范及方法论的干涉主义策略,提醒读者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学术研究既鼓励统一性又宣传多样性。

在第六章“性别与翻译”中,冯·弗洛托(Luise von Flotow)把性别研究分为第一性别范式和第二性别范式。她强调第一范式,指社会中能够被识别出男性或者女性的群体,由社会塑造而成、具有一系列固定行为特征的传统性别概念。她进一步表明在第一性别范式下的翻译研究趋于支持女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聚焦在父权社会制度下,作为特殊少数团体的女性受到的不公正待遇(P.93),恰如翻译处于附属地位、译者被忽视,其代表人物有戈达尔(Barbara Godard),西蒙(Sherry Simon),张伯伦(Lori Chamberlain),利陶(Karin Littau),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等。而第二性别范式萌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考虑到各种复杂因素而倾向于把性别看作不稳定的、可改变的行为,认为不可能、或者不明智断定一个人是男性还是女性。这种模式下的翻译研究被看作不确定的、具有演出性质的行为,代表人物有巴特勒(Judith Butler),梅尔(Carol Maier),哈维(Keith Harvey)等。在两种模式下的翻译研究,取决于译者接受还是拒绝这种身份识别,冯·弗洛托认为,生产者(译者、出版商、编辑)可以选择过分自信的、激进的立场,翻译时尽量张扬性别方面的特点,使干涉手段清晰可见(P.104)。

在第七章“戏剧与歌剧翻译”中,玛丽·斯奈尔-霍恩比从翻译研究的角度回顾了舞台剧本翻译存在忠实语言和表演性语言的矛盾,主张舞台翻译研究需要采用合并的方法,如把符号法(图标、信号、象征和辅助语言、体态语言、空间语言)和综合法(可表演性、可说性、可唱性)结合起来使得翻译文本具有表演性。为了达到戏剧和观众的最佳互动效果,符号法

应包含社会文化因素在内,体现在理解道具所传达出的内容以及观众对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下的理解能力(P.112)。有关歌剧翻译,剧本成为歌词、音乐和表演的合成物,与表演性、呼吸法和可唱性统一起来达到表演效果。作者认为舞台翻译非常复杂,并举例证明译者和舞台表演形成一个团队,真正参与到舞台表演中去,这样翻译文本质量才得以保证。

第八章欧康奈尔(Eithne O'Connell)的“屏幕翻译”指出现在屏幕上的各种视听文本的翻译,与配音、字幕和语言的重新表达(revoicing)有关。论文梳理了屏幕翻译的一些关键技术概念,强调目前屏幕翻译的主要形式以及在特定情境下影响屏幕翻译选择方法的因素,辨析了配音和字幕的优点和缺点。作者提醒读者,屏幕翻译存在着张力,既促进语言转换又起着约束它的作用(P.121)。对于字幕翻译的约束方面,指的是实时(real time)字幕,包括时间(说话太快只能概括)、空间(屏幕上每次只能容纳30到40个词)和技术上(屏幕下方最大限度允许两到三行)的约束;配音中的约束翻译则指同步配音(视觉、内容、听觉)。值得一提的是语内字幕翻译适用范围广泛,如为聋哑人提高语言理解能力;而语际字幕翻译,更能间接促进移民以及其他少数团体的外语学习,屏幕翻译为语言教育开辟了一片重要新领域。屏幕翻译研究具有时代性,它通过视频媒体推广通俗文化,与大众生活和电子科技发展息息相关。然而,作者似乎提出警示:未来屏幕研究更可能集中在科技发展方面,从而忽视了翻译本质的跨学科研究。

在最后一章“翻译与政治”中,谢芙娜(Christina Schäffner)通过一些实例来引出翻译和政治的话题。作者从三个方面来阐述翻译与政治的相互关系:翻译政治、政治文本的翻译,以及翻译研究的政治化。针对翻译政治,译者在社会语境下从事翻译,是社会语境的一部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无疑会受到权利等级和潜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翻译策略都是一种政治决定。如屏幕翻译采取配音而不是提供字幕,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干涉,因为实际上它阻止了观众通往原文的通道(P.139)。谢芙娜对政治话语的翻译研究中,探讨了政治文本的特殊性以及社会政治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强调译者的政治背景知识对理解政治文本的重要性。在论述翻译的政治化时,作者认为,翻译是政治行为的工具,在一种政治语境下,不能不被政治化。总之,翻译与政治的关系反映在翻译作为产品的研究,以及探讨翻译在产生和接受过程中的社会政治条件(P.147)。

二. 主要特点

本文集选择的研究主题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突破,视野也很开阔。自从翻译研究这门学科诞生之日起,不乏专家学者强调翻译学的跨学科性质,却大多缺少系统论证。有的文集虽以此为题(Snell-Hornby *et al.*, 1994),话题涉及广泛,事实上却没有几篇真正从跨学科角度探讨翻译研究;也有专著设立章节讨论翻译学的跨学科研究(Munday, 2001),只从对比语言学、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三个方面考虑;或者择其一进行研究,如巴斯奈特和王宁倡导从文化研究角度考察翻译学;从其它相关领域探讨翻译则是零星提及。而本书由来自不同国家的翻译理论家专门供稿,九大章节以翻译研究为核心,如同九大行星围绕太阳,有各自的运行轨道,却又根据内容形成既有联系又相互独立的不同主题。纵观每一章节,不仅对相关领域和翻译研究已经取得的互动成果进行历时、共时的缜密梳理,凸显其不同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理论主张,从不同侧面清晰地勾勒出翻译研究发展的传承流变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在基于分析推理的基础上,为翻译研究跨学科道路指出未来发展方向。本书虽然出版时间不长,但是已经受到翻译研究同行的广泛重视,在国际英文期刊专门的评论文章即将安排出版。

②

该文集对翻译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司空见惯的模糊观点予以澄清,如巴斯奈特针对有些人认为翻译研究的本质就应该聚焦于翻译过程的语言方面时明确指出,“翻译是涉及语言,但是语言是文化中的语言,语言行为发生在语境中,文本是在文化这个语境的连续体中产生,

绝不是真空中产生”(P.23), 强调翻译、语言和文化三者密不可分; 安东尼·皮姆认为翻译的理论化建构“依赖哲学话语在程度上远远超过哲学家认真思考翻译”(P.33), 论及哲学在翻译研究中的作用时, 对一些翻译理论家动辄引用哲学家的片断观点旨在为自己的理论增加筹码而提出批评, 认为翻译研究要从实际出发, 哲学不一定能够指导翻译从下而上的应用问题; 琳·朗对翻译史外延的扩展使翻译史定义更加完善; 冯·弗洛托在第二性别范式模式下对翻译研究的影响等, 这些观点无疑会给人一种清新之感, 令人回味无穷。

同以往西方翻译书籍几乎对中国只字不提或者一般作为负面例证相比, 该文集中有多位作者提到中国, 虽然多数作为个案研究的例证。如巴斯奈特提到翻译研究在当今中国欣欣向荣的时代背景(P.17)以及庞德的诗学翻译构建了遥远而神秘的中国意象(P.22); 琳·朗提到佛经翻译对中国语言的影响(P.66)以及中国对易卜生剧本的研究(P.71)等,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翻译研究逐渐引起西方翻译学者的关注。

另外, 该书收集的论文勇于开拓翻译研究新领域。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全球化的进程中, 大众文化传播以及视听多媒体的普及给舞台和屏幕翻译带来契机, 这方面研究在中国还不多见, 零星几篇多是复制西方的研究成果。它启发我们, 要扎根于现实的问题拉动, 深入自己的个案研究, 激发学术研究的自主性, 敢于提出新的理论话语。

三. 不足

其一, 大部分章节强调翻译研究单项吸收其他相邻学科营养来武装自己的被动局面, 反之, 翻译研究对其他学科的互动作用谈得不够, 存在着研究不平衡问题, 而读者更期待翻译与相邻学科的双向互送的对称研究。其二, 部分概念不清, 如巴斯奈特关于“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的解释, 虽然文中作为一个重要部分标题, 却只有一句粗略的定义——“文化资本大体上可以解释为个体有必要被看作属于社会中‘恰当的圈子’”(Cultural capital can be loosely defined as that which is necessary for an individual to be seen to belong to the ‘right circles’ in society)(P.19)。而且, 所给的例子看不出与定义之间太大的联系, 令人费解, 如作者引用勒菲弗尔讨论维吉尔的《埃涅伊德》(Aeneid)作为文化资本地位的改变时指出, 教育体制是创造和传递文化资本的主要控制手段。同样, 在赫曼斯阐明文学翻译的特别之处时, 观点发散不明确, 作者用论文的三分之一篇幅旁征博引“文学翻译”概念, 并由于所给概念模糊而逐一反驳。这种论述方式激起了读者的兴趣, 一定要探个究竟, 到底什么是文学翻译以及它的特色之处, 结果徒劳期待, 同样找不到明确概念而收场。其三, 对于目前存在的另一种声音——文化研究使翻译学偏离研究轨道走得太远, 从而忽视翻译的本源研究——呼吁翻译研究语言回归一字未提, 不免暴露其局限性。其四, 该书有几处印刷错误, 如“interdisciplinary”(P.6)(应为 interdisciplinary), “Humbolt”(P.26)(应为 Humboldt), “becamethe norm”(P.121)(应为 became the norm), “at will. and”(P.132)(应为 at will, and), “ideas.”(P.138)(代替 ideas.)以及“literature, includes”(P.138)(代替 literature includes)。

四. 小结

本书反映了翻译研究最新发展成果, 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是, 目前翻译学的跨学科研究处于初期阶段, 还有很多地方亟待完善。因此, 在研究中要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 有主次之分, 即所研究的相邻学科和翻译研究保持多大距离, 是属于翻译研究的家庭成员, 朋友还是熟人? 其二, 翻译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恒定不变的, 而是动态发展的, 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对比语言学对翻译研究的强壮势头, 如今研究重点转移到翻译学的文化研究。其三, 掌握好“度”的问题。不可以随便拿一个学科与翻译交叉、嫁接, 要避

免浅化和泛化研究。

注释

1. 只标明页码的引文均出自《翻译研究导航》。
2. 该信息从吉迪恩·图瑞在2007年12月30日写给作者的邮件中得知。

参考文献

- [1] Bernheimer, C. (e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 [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 [2] Cronin, Michael. *Across the Lines: Travel, Language, Translation* [M]. Cork: C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 [3] Culler, Jonathan. *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M].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4] Holmes, James 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 in Lawrence Venuti(eds.).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75.
- [5] Kuhlwezak, Piotr & Littau, Karin (eds.). *A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C]. Clevedon, Buffalo and Toronto: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7.
- [6] Lefevere, A. Composing the Other [A]. In S. Bassnett and H. Trivedi (eds.)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C). London: Routledge, 1999: 75-94.
- [7] Munday, Jerem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181-191.
- [8] Snell-Hornby, M., F. Pochhammer and K. Kaindl (eds.).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e*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4.
- [9] 马太·多甘, 罗伯特·帕尔. 社会科学中的杂交领域[A]. 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C].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Research on the Interdisciplinarit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Reviews on *A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CUI Rong-hui

(School of Translation & Interpret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at Weihai, Weihai 264209, Shandong, China)

收稿日期: 2008-07-12; 本刊修订: 2008-11-30

作者简介

崔莹辉,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 06 级博士生,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翻译学院副教授, 目前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做访问学者。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E-mail: cuiyinghui@ufl.edu